

介入“生活世界”

——对“技术时代哲学何为”的一种回答

刘 博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技术的时代, 技术所辐射的已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现象, 同样深入到了人的意识层面, 成为这个时代意识场域的核心关注之一, 这样的技术不仅造福人类生活, 同样也携带着更深层的风险与失控, 而哲学通过“生活世界”这一迂回境域而非直接介入技术, 把自身成果转化为生活中的观念, 助推生活世界的诸多要素恢复其整体相关性, 从而从技术生成的源头缓解技术在当下时代带来的不良影响, 实现技术时代的哲学有为。

关键词: 技术时代; 技术失控; 哲学何为; 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1) 04-0040-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1.04.007

Involving in the “Life World”

—An Answer to “What Can Philosophy Do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LIU Bo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200433)

Abstract: The era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radiation is not limited to material phenomenon, also deep into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become one of the core attention of the era consciousness field. Such technology not only benefits human life, also carries deeper risks and is out of control, and philosophy through the “life world”, which is the circuitous domain, rather than direct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st heir own achievements into the concepts of life, boosts many elements of the life world to restore its overall correlation, and thus from the source of technology in the present era, realizes the philosophy of the technology era.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age; technological runaway; what is philosophy for; life world

技术的时代, 哲学能做或者需要做什么? 这是时代抛给哲学的一个问题, 亦或者说这是哲学从时代中提取出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较为独特的内涵, 由其孕育出的时代精神之哲学也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迹, 并在自己的时代或其后的时代中绽放光彩。哲学出于时代, 又总是要回到时代里去。如此, 来自当下时代——我们称之为“技术时代”的时代之思, 该如何回到时代中去? 或者说, 在当下的技术时代或技术塑造的生活世界里, 哲学何为?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对“技术时代”进

行必要的分析和把握, 诚然是首先要做的。

一、技术时代的现状

用“技术时代”来描述当下这个历史时期确乎是名副其实的; 不论是与大众密切联系的生活日常, 抑或是与此有些距离的前沿领域, 都可以看到技术的身影。在某种程度上, 技术俨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把人类自身——囊括于内的大帝国。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 与其说技术广泛散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毋宁

收稿日期: 2021-06-24

作者简介: 刘博 (1996—), 男,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说人类的生活已经镶嵌在了技术提供的形式和框架基础之上。在与进步史观的相互扶持下，技术（“自动的”“机械化”的技术）也已风风火火地发展了两三个世纪之久，在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礼和壮大、第四次突破又呼之欲出的时代背景下，其表现出了大有取代“弥赛亚”建立新世界的雄心壮志。虽说如此，当下所谓的技术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时代呢？

（一）有扩张的技术时代

技术在当下已经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诸多领域和不同层次。在技术的协助下，人得以逐步从自然世界中脱离出来，迈入一个由技术覆盖的人化世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技术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人对自然的独立程度，而人对自然的独立程度又反映着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在历史的年轻阶段^[1]，技术的发展还处于萌芽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技术的种类及层次程度都还极其有限，作用于生活的领域也极为狭窄。在这一阶段，技术只能充当改善人处在自然中的境况，并且这种改善自身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而当下的时代，技术本身在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之后，无论是在自身的类型的丰富和更新上，还是对生活的深入渗透和应用范围及领域上，抑或是技术王国的建立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开创了这样一种可能：技术具备了一种广泛存在和开拓的能力，在此之前技术还无能为力，而在此之后只能是这种局面的延伸或延续。

技术革命极大丰富了技术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逐步把原有的生活转移到了由技术联结的王国：对原始天然的功能或习惯进行取代或改造，改变着既有的传统，重塑着新的技术的生活和习惯。技术及技术的产物，越来越成为生活意识中天然的存在物：天黑了会自动想到要打开电灯。技术正在原有的世界中重构一个新的世界：它不是否认原有的世界，而是通过对原有世界的增添和改造、更多的是使自身成为联结人与人之外的事物媒介的方式来彰显着自身的创造和价值，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身塑造成为时代本身的因素之一，就如同康德的时空观念之于人的认识一样。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技术也随即填充了自然离去后

的位置。

不止生活领域，“技术”作为一个概念也走入了时代关注的核心区域。在过去，技术多是作为一种客观的技艺或知识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而非在人的思考和意识世界；即便在一些时候它被纳入到了意识的领域，也是处在一个相当边缘的位置，以至于后来斯宾格勒和吉尔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技术是无思的”^[2]、“技术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忽略了这一点”^[3]。而在当下，它不仅进入到人类精神的大书，还成为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成为人的意识要把握和思虑的重要对象，完成了从意识的边缘走向了思想的中心。

随着“技术”影响力的扩大，其重要性被重新发现，史学界也据此对历史展开了新的解读，以“技术”为重要参考依据的历史观也产生了，技术因此获得了对历史进行重新编码的特权，如“石器时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以技术的变迁为尺度所进行的代际划分，使历史打上了技术的烙印^[4]。此外，有学者还认为，自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种种如资源开采、工业发展以及核试验等的活动，不仅改变了地表地貌，而且已经深刻影响了地球的各个圈层，使地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在未来的地层的沉积中，自当下的时代开始，地层中会出现以往的地层中不曾出现的沉积物，如核废料、“标准化石”塑料等。一个不同于“全新世”的“人类世”诞生了^[5]。

只不过，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利己与利他的完美结合。随着技术的扩张得到促进的，不只是技术的影响力与人生活的便捷和丰富，还有着人类生产生活废物在时空中的扩散蔓延：不论是远方的极地，还是超越地平线的太空，抑或者遗祸给未来。如果说这些不利只不过是技术便民服务的不得已的副产品，那么被技术渗透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失控事件以及技术对人的反控，就不仅仅是副产品层面的问题了。

（二）有失控的技术时代

“技术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失控”。在对失控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技术失控与技术失

误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技术失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无能，而技术失控让人感受到的是恐慌和无能为力；技术失误任何时代都可以发生，技术失控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可以说，技术的一个本质特性就是对人的超越，在很长久的时代里，技术都扮演着人的身体的延伸，而且是更为方便和有效的延伸。“技术时代”的技术延续着技术的这一本质特征，并且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展现出了其对人类的超越与人类对其超越的惊叹和某种忧患^[6]；而这种忧患在人类对技术的失控中加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技术与其自身历史的划界，因为现代技术在人类在社会进步观念的指引下奔腾向前的“去蔽”的进程中实现了“生蔽”：一种未知，一种脱离了掌控和在好似“去蔽”的空间行为结构中新增了遮拦。经验世界发生的那些技术失控以及引发的始料未及的事件都给人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人并不像人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的造物。

维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真理就是创造。人能够认识、理解他自身的造物，“认识和创造是一回事”^[7]。但是面对当下的技术，这一命题显然地要被动摇了。人的知识和创造力相对于自身而言是进步的，可是相对于他所创造之物而言，却呈现为逆向的运动，表现为创造者越来越无法掌握和理解他的造物，它的造物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表现出了对他的超越和让他感到不安或威胁，而身为造物者的人却并没有上帝的全知全能、知晓一切来免除产生无能为力和恐慌。历史正在人的认识中恢复其客观的存在性，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就是越来越不被人控制、理解但又发展速度极快，甚至已经对社会生活造成了极为不良后果的现代技术，它正在与历史达成合谋，上演着另一种版本的“理性的狡黠”。

而技术失控的另一个表现，有的人表述为技术对人的“反控”，有的人表述为人的技术化^[8]。前者认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一种异化的关系，人在这个过程中是表现为退化的；而后者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是人的创造化的过程^[9]。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无论是人的创造化这种乐观角度还是人的异化（退化）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视角，都显示出了一种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景象，即技术的地位或身份表现为相对于人所说的“升格”。在当下的场域中，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了主角的光环，在人与技术的主奴关系中带有了几分主人的特征。

维科认为，自然之物是人类思想和认识的边界；但在当下，技术这一人造物已悄无声息地生长繁衍出了一片人所未掌控和未理解的区域，随着一系列技术事故的发生，这一区域为人所觉察，并逐渐认识到了对这一区域的无知。人自古以来对未知都保持着敬畏，而当下源于技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无知，而是知其无知。在这种境遇下，知其无知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无力和恐惧的源头。这里的恐惧不是一种单纯的孤立的情绪状态，而是众多现实的技术失控事故累积之后的生成，是一种知其源头、有现实证据证成后地对现实事件的凝缩反映。纵观技术的发展史，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为人所控制的技术失控事件越来越频繁，危害性也越来越大，不禁使人发出“技术不能再这么下去”的声音。

（三）有反思的技术时代

贝尔纳·斯蒂格勒说过：“技术是人类的解药，也是人类的毒药。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去应对技术的时代。”^[10]技术时代自身内生着对自身的思考，这是当下技术时代的又一特征。技术不仅深入到人的意识领域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成员，而且还步入了反思的阶段。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初期，人们沉浸在技术带来的丰富的喜悦和忙碌中，技术的弊端还未能得到充分的显现，人也还无暇顾及或者还没有显著的迹象刺激人去发掘技术所潜藏的危机。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如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以及卓别林电影中经典的“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都带着对技术可能带来的或带来的问题的思考^[11]；只是说人们开始较为广泛地反思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对技术的反思并且最早引起较大关注的是来自自然科学工作者，这些人中多数也都是环保主义者。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与自然保持着密切接触，使得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的研究和观测过程中逐渐接触和发现技术带来的“另类产物”，看到了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而后积极传播了自己的发现，并呼吁人们对技术的审视和对环境

的重视。加之现实中的技术与环境灾难，像“世界八大公害事件”这类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的突显并表现有常态化的趋势，环境问题日益被人类所重视，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技术的关注点的转变。人们不再只是关注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和享受，同时也会注视这种技术在带来福利的同时会滋生哪些副产品，而关注点也由环境扩展到了技术涉及的各个领域。虽然主导的依旧是技术进步论的观念，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第一位的，但是一些改变依旧发生了，人们在注重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会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超越技术自身的层面来考虑技术，考量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反思正在试图成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说必然的伴随者。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负责任的弗兰肯斯坦。只不过这种内部的反思存在着两方面显著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反思的力量过于弱小，以至于当它与发展着的技术正面博弈时，总是表现得差强人意或者无限的妥协；另一方面就是事后性，只有技术产生了不良的副产品之后才启动了这一机制，虽然可能会启发技术的发展往这方面靠拢，但滞后性的损失已经付出了。而且，后一方面也暴露了技术自身发展的一个问题，即发展的不合法第一性的问题。“不合法的第一性”在技术时代可以说十分普遍，其表现就是，众多技术并不会在诞生之后接受思想实验这样形式的讨论和考量并由此决定其是否要推广使用，而总是在推广使用之后才有机会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反思，而这个反思也只是第二性的了，它对技术本身的效力有限。

面对技术带来的这些问题，技术能否通过自身的发展完善使其得到解决？这是毋庸置疑的，技术的发展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这种解决，往往是以以后付出更大的潜在代价作为交换的。技术对具体的问题可以提供暂时性的解决，但是对技术自身的问题，技术只能将其诉诸另一个技术。可以说，技术产生问题的机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会直面的问题，或者这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用技术应对技术，也必然地带着滞后性的弊端。这就需要不仅仅关注当下技术产生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把目光投向

未来和更为始源性的方面——技术的生成土壤。而哲学恰好具备技术所缺失的这种能力。

二、技术时代，哲学何为

技术时代，哲学何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哲学何为”的合理性问题——哲学为何“为”？哲学“为”的依据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给予解释。一方面，哲学可“为”是由哲学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哲学（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由philos（爱）、sophia（智慧）两部分组成。哲学的这种本性，决定了它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域中，都会积极实现自身的在场，在对往昔智慧的热爱中，不可避免地添加着从当下时代及其具象中所思所感所想的内容，使得时代和智慧在自身的运动中相互成就。这是哲学自身的本能而与外在无关。时代等外在的变化不过是意味着哲学的对象的改变，对于哲学自身的本能并没有本质上的影响。不论技术的时代对哲学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哲学都会按照自己的本性出场，把技术时代和它的相关具象作为自己的对象加以考量和把握，书写着时代的精神之思。

另一方面，哲学的“为”是时代的邀请。技术时代，尤其是在技术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步入快车道而技术自身“先天”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技术实现了繁荣而其相应带来美好的允诺仍处于缺席的境况下，当下时代的人向包括哲学在内的众多知识门类发出邀请，以期改善和克服技术自身的弊病以及技术带来的无论是物质层面抑或是精神层面的不良影响，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人的生活服务。在众多的知识门类中，哲学在意识上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是“名词式”或“摹状词式”的，而是“动词式”的，即它的知识自身是一种思维的恒常运动式，是针对人的意识的学问；加之“当下时代对技术反思的迫切”，这更突显了哲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于是乎，在技术时代，哲学不仅必然会“为”，也大有可“为”。

（一）哲学介入的现状及其启示

哲学何为？此处的“何为”并不表示开始或以往未有之意，对技术时代的反思过程中，哲学早

已开始有为。它利用自身的思辨性去各个领域探索,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种类丰富的“领域哲学”,同时也拓宽着哲学思考的对象领域的边界,只是其对涉足的领域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多是以理论的形式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哲学”的圈子内传播,其涉足的相应领域对哲学的插足并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兴趣和好奇,对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多是闻所未闻。

在技术的加速发展的助力下,社会的节奏也在加快,连带着认识也在发生着某种细微的变化,这也使得传统意义上哲学所追求的“真”也受到了波及。探寻到“真”,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认识侧重发生变化的时下,认识的意义侧重在很大程度上由“可知”和“不可知”的层面向“可及时知”与“不能及时认识”的层面转变,对认识的定位也更侧重于其及时性方面的考量(并非与正确性相对立)。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及时的知或假知的影响下,缓慢地、还未探寻到的“真”或是被似乎善变的表面掩埋而错过,或是达到了也已成为过时的“真”。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控制着节奏,使得身处于技术时代的无论是习惯或文化,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都在适应技术的节奏中重置自身的准则和机制,在技术的影响下实施着对自身的否定与重塑。哲学积极探索着介入的领域并期待着相应的领域能够“广开言路察纳雅言”,然而受资本控制的科技显然不会成为值得哲学期待的对象。

这是对哲学的某种程度上的拒绝,“领域哲学”终究还是哲学之下的理论思想,不能对它之连接的领域产生实际的影响力。然而,从哲学试图直接介入技术的被拒绝中,不应只看到拒绝,还应该看到,对哲学与技术的关系的侧重不应停留(或只停留)在哲学是否能够对技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方面,更应该转移到哲学介入技术的方式上:变“直接介入技术”为“迂回介入技术”。

(二) 介入生活世界

无论是追逐“科学之科学”时代的哲学,还是对哲学自身来说是重大转向时期的哲学,哲学之于科技的意义和影响多不是参与到具体的科技活动的领域;它总是借助助推伟大历史时刻的来临,造

就着伟大发现所需要的社会或思维环境。即便是世界观或方法论,“历史人物”也可以不经过纯粹的哲学而习得,因为他们作为时代的一分子,可以直接从生活世界中获得它们的指引。即是说,哲学之于科技的影响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实现。科技可以不特地“拜访”哲学,但是却不能免于从生活世界中经受熏陶和影响。而哲学自身的成果又总是会在生活世界中得以展现。

哲学与技术之间能够作用的途径并非只有直接将两者拼凑到一起这一条途径,且这一途径使得各自带有各自比较浓厚特性的两者在交流或借鉴的过程中并不和谐;而生活世界这一中间场域,就像是一个大型信息转码枢纽,把它所接受的东西稀释扩散到自身的众多领域,而身处其中的存在各自又在潜移默化中经受着这种转化观念的影响。这对于哲学来说不失为另一种途径——有别于直接连接的途径。哲学自身也总是要把自己的重要发现推广到生活世界中去的,而生活世界把这一重大发现纳入其中,在生活世界中以另一种形式展现,而身处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经受着哲学的影响和洗涤。并且,经过生活世界的转码,哲学与它所想要作用的对象之间的交流沟通便会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为什么是通过介入生活世界这一途径呢?这是由于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的^[12]。“技术是物化为人造物的技术”,从深层看,“它是生活世界或生活世界诸要素和关系的聚集与反映”^{[13]42}。作为一种人造物,它带有着人造物共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物理结构,另一方面又拥有某种功能^[14]。人造物的功能性质并非人造物本身具有的,它依赖于使用者或设计者的意向性活动;而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这种意向性才得以展开,人造物的功能才能得以发挥^{[15]149}。为何当下技术时代技术的功能带有着如此多的不良后果呢?这是因为生活世界诸要素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生活世界是一个由所有被结合在一起的要素构成的共同存在着的、具有整体相关性的世界。”^{[13]45}在生活世界中,众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只是在技术时代,这种要素间的整体相关性被打破了,个别要素如资本、效率取得了主导地位,而技术也由原本对生活世界诸多要素的呈现转变为受某

些要素驱使的境地。如此，技术也越来越从经验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转入侧重理论旨趣而非日常实践旨趣的实验室，其赖以发生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割裂越来越剧烈，在生活世界中的应用也表现出更多的水土不服^[15]151。

而哲学介入生活世界，使人在生活世界中接受为生活世界所接纳并成为其一部分的哲学观念的熏陶。鉴于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割裂起因于某些要素对整体相关性的背离，哲学便可以以此为突破口，以整体论等相关理论为先导，促进其在生活世界的精神内化，以期能够唤醒在技术时代失声的生活世界的诸多要素，打破个别要素在生活世界中的主导局面，恢复诸要素的整体相关性，重新回归众多要素共同发挥作用而又不脱离整体的生活世界状态，从而在技术生成的源头更好地缓解技术时代下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冲突。

技术塑造着生活世界，哲学的成果也总是会或快或慢地被生活世界吸收而成为其观念的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方主要作用于生活世界的观念等形而上的方面，另一方构成了生活世界的物质形态等形而下的部分。只不过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哲学更多地徘徊在经验生活之外，不重视感性经验与直观，与技术长期处于一种疏离状态；随着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偏离，这使得尚未介入生活世界的抽象描述性的哲学并不具备与技术进行有效对话的条件，即便开展对话也多草草了事。但是即便如此，却也不能断然否定这种有效对话存在的可能，因为这种可能正在通过技术的自身特征呈现出来；可以说，技术时代表现出的技术的反思特征表明，技术主导的生活世界呼唤着某种缺乏的力量的补位，而这一缺乏力量就是与技术统一于生活世界的反思的哲学。可以说，介入生活世界其实本质上就是恢复生活世界自身的完整，即恢复生活世界中各种要素的整体相关性，而这种整体相关性在当下具体的生活世界情境中即变现为一种哲学式的反思或慎重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针对技术的力量而设置的，而是回复到生活世界的稳定和延续所内在需要的。

三、结语

“哲学何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甚至一度是

一个令哲学很尴尬的问题。而随着科学的崛起和技术的发展，“哲学”与“无用”之间又在人们的共识中组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搭配。无论是生活大众的经验加持，还是哲学人们的自嘲，抑或者是有意对这种说法给予纠正时对这一观点的必要引用，这些都自觉地扩大了这一组合的曝光率；并在这样一步步地传播中，对哲学的这种误解也逐渐自然化、常识化、问题化，于是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个问题以这样一种新的形式被提出来也算是“自然而然”了。

但哲学毕竟不“无为”，即便是在当下的技术时代也同样如此；而且对哲学介入技术的侧重不应停留（或只停留）在哲学是否能够直接对技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方面，更应该转移到哲学介入技术的方式上。哲学的“为”不是一种直接介入技术的一种“有为”，这也不是它所主要“能为”的方面；哲学的“为”主要是通过介入生活世界或者说回归生活世界，只不过面对当下的现状，未介入生活世界的抽象描述性的哲学以及回归到生活世界中的单纯的哲学都不足以对主导了生活世界的技术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即是说，仅仅靠哲学内化自己的时代之思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路径，并不足以达到恢复生活世界诸要素的整体相关性，而技术也就无法恢复其对生活世界诸要素及其关系的聚集的状态。哲学必须从技术异化的源头即生活世界诸要素整体相关性的破坏入手，通过自身的时代之思，唤醒在技术时代失声的整体相关性要素；如此，技术的生成才能不再只是受个别要素驱使，而是成为生活世界多种要素的物化聚集，实现其向生活世界的朴素性的回归，重回其与生活世界的和谐^[16]。

【参考文献】

- [1] 弗朗西斯·培根. 新工具 [M]. 许宝溪,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61-62.
- [2]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M]. 裴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
- [3] BILLE B.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M]. Paris: Gallimard, 1977: 1475.
- [4] 陈其荣. 科学技术哲学论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210-224.

(下转第50页)

违约金及其他经济损失,被告冯玉梅在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时,就特别说明“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请求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违背了法律规定”故在当事人诉求不明时,裁判机关往往会陷入难以合理抉择的困境。

四、结语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在我国合同法体系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规定仍不算完善,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也并不一定算是完美。不论是从整个合同法体系上而言,还是就单个制度的构造而言,仍然有待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亦可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吸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有利规定;在具体制度构造方面,还

应当增加双方违约等特殊情形的处理;同时在面临难以合理抉择的困境时,应当适当发挥裁判机构释明权的作用,引导当事人提出有利的诉求。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 上 [M]. 蒋兆康, 译. 林毅夫, 校.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2] 孙良国, 单平基. 效率违约理论批判 [J]. 当代法学, 2010, 24 (6): 72-78.
- [3] 石佳友, 高郦梅.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 争议与回应 [J]. 比较法研究, 2019 (6): 36-52.
- [4] 王利明. 论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申请解约 [J]. 法学评论, 2020, 38 (1): 26-38.
- [5] 杨明刚. 论双方违约 [J]. 人民检察, 2000 (7): 10-14.
- [5] 刘学, 张志强, 郑军卫, 等. 关于人类世问题研究的讨论 [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5): 640-649.
- [6] 张成岗. 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4): 32-38.
- [7] 韩震.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0-51.
- [8] 盛国荣. 技术控制主义: 技术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J]. 哲学动态, 2007 (5): 36-42.
- [9] 闫坤如.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及其本质探源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100-107.
- [10] 顾学文. 技术是解药, 也是毒药: 对话法国哲学家贝纳尔·斯蒂格勒 [J]. 精神文明导刊, 2018 (7): 47-49.
- [11] 高亮华. 技术失控与人的责任: 论弗兰肯斯坦问题 [J]. 科学与社会, 2016 (3): 128-135.
- [12] 张桂芳, 陈凡. 技术与生活世界 [J]. 哲学研究, 2010 (3): 110-114.
- [13] 舒红跃. 技术与生活世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4] 刘宝杰. 关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的述评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5): 51-56.
- [15] 胡塞尔.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 [M]. 吕祥,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16] 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M]. 张庆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70.

(上接第 45 页)

